

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与美日的 “台湾地位未定”论

余子道

内容提要 《旧金山对日和约》屏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参与、拟制与签定,掩饰日本国军主义侵略战争的罪行,在安全与政治、领土、经济等条款和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处处违背盟国有关对日政策的国际协议。它不仅不是一个全面的对日和约,而且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条约。以旧金山和约为基准的所谓《中华民国与日本间和平条约》,是美、日、蒋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而促成的一个双边和约,它在实际上构成为“旧金山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政府利用蒋介石政府处于弱势地位又急欲缔约的情势,竭力迫使对方退让,在许多重要条款上达成有利于自己结果。日本政府选择台湾当局与之签约,而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缔结和平条约,违背了中国人民和广大日本人民的意愿,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在实际上确认了由杜鲁门政府炮制而获得吉田茂政府支持和参与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违背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和日本政府在《乞降照会》中的承诺。这两个和约在国际条约中对台湾地位问题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为美国和日本的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制造根据,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关键词 旧金山和约 日蒋和约 台湾

一 冷战格局下的《旧金山对日和约》

台湾蒋介石政府与日本吉田茂政府在 1952 年 4 月订立的所

谓《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本文以下一律称为《日蒋和约》),是1951年9月《旧金山对日和约》的派生物;两者都是在冷战格局之下,由美国政府一手操纵和导演下完成的,是贯彻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意图的一种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挟其强大的战胜国之余威,向远东伸展战略势力,广及西太平洋和东亚大陆。被美国以盟国的名义实行军事占领的日本,是美国在西太平洋上面向东亚大陆的战略阵线的核心基地。美国在日本实行了一条巩固美国在日独霸地位的路线,力图把日本变为美国称霸世界东方的一个基地。从杜鲁门政府开始推行的美国上述政策,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与战后逐步形成的美苏两大国争霸、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密不可分。

当战后冷战格局形成,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又节节获得胜利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从它的新的全球战略出发,决定把原来的敌国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支柱,以遏制与反对苏联和中国革命,并围堵新中国。为此,美国改变了它在占领日本初期推行的比较彻底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政策,改而刻意扶植日本,使之成为它在远东最重要的盟友和最大的经贸伙伴。而受到美国扶植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和不甘失败的军国主义势力,也亟图指望依靠美国,实现其潜在的帝国主义野心。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和日本当局自1947年以后,就急欲谋求结束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状态,让日本以主权、独立国家的地位,以美国盟友的身份,重返国际社会,充当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亚洲基地。

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在外交上和国际关系上所采取的主要举措,就是联络大战期间对日作战的盟国与日本签订符合其需要的“对日和约”,同时建立美日两国的“安全保障体制”。

1949年和1950年,在远东发生一系列足以改变亚太战略全局的,甚至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949年中国革命获得

胜利,人民中国宣告成立;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订立;同年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的战略视野中,这一系列事变是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蔓延,是苏联阵营的扩张和向“自由世界”的挑战。正如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所作的判断,由于美国失去中国大陆,日本在其战略天平上的地位更显重要。“无疑,美国人对中国混乱局势的反应是:另择对象。作为在远东的新的依靠,日本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对象。并且,依我看来,美国急于要使一个重新整顿过的日本,同印度一起参加一个集团,以阻止共产主义威胁的进一步扩展”。于是,美国加紧了对日本缔结和约的步伐。

1950年4月,美国共和党人杜勒斯被杜鲁门任命为国务卿艾奇逊的高级顾问后,即积极进行缔结对日和约的活动。同年9月14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业已授权国务院,就对日和约的程序问题,与远东委员会其他会员国家进行讨论。美国认定以国际会议来起草对日和约,必遭苏联的干扰,遂采取与各国进行个别磋商的办法。杜勒斯乃与关系各国进行个别交涉。10月26日,美国政府提出一份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备忘录,其中提出缔约国家是所谓“任何或一切愿意在所建议的和可能获得协议的基础上缔和的对日作战国家”,而不是全球对日作战国家。这就是企图把中国和苏联排斥于缔约国家之外。苏联政府于11月在致美国政府的备忘录中,对美国备忘录提出质询。

中国政府研究了美苏两国的备忘录之后,于12月4日授权周恩来外长发表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声明》全面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对日和约的原则立场和方针政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9分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页。

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在力求于尽可能的短期内,缔结共同对日和约,以便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状态,使日本人民早日获得民主与和平。《声明》批驳了美国政府对日和约备忘录拟定的方案。指出它违反盟国共同对日作战的目的,破坏所有有关对日政策的国际协议。并且强调:“开罗宣言、雅尔达协定、波茨坦公告及……远东委员会各国所同意通过的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乃是共同对日和约的主要基础。《声明》严正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的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对日和约的准备和拟制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与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1951年1月杜勒斯以杜鲁门特使身份组成访日使团赴东京,会同各盟国驻日代表团与日首相吉田茂进行和约问题的会谈。日方提出五项《要望书》。美日双方获得协调后,杜勒斯在2月28日在华盛顿记者会上声言,将于次年年中缔结对日和约。同年3月,美国政府将对日和约草案初稿分送53个有关国家政府。7月12日,美英两国政府将这一由美国炮制的草案,在华盛顿、伦敦及其他40余国首都予以公布。7月20日,美国政府发出于旧金山召开对日和约会议的通知,邀请50个国家在9月4日参加和约会

《周恩来外长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1950年12月4日),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91页。

日本吉田政府五项《要望书》,1951年1月30日吉田茂提出,主要内容为:1. 恳求以宽大之讲和作为日、美两国将来友好的基础。2. 重整军备之事,在未达成经济自立前无法实行;讲和后国民之总意决定自卫力之保持。3. 讲和后,为确保日本自卫力,要求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防集团的保障。4. 为了经济自立,恳愿美国之经济援助。5. 关于冲绳、小笠原群岛的地位,日本国民是希望其归属日本,政府方面则取慎重之态度。

议。8 月 15 日,美英两国政府不顾苏联、中国等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单方面正式公布《对日和约草案定本》。同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对美国炮制的和约草案进行全面的抨击和批判。《声明》指出:“美英两国政府所提出的对日和约草案是一件破坏国际协定,基本上不能被接受的草案,而将于 9 月 4 日由美国政府强制召开、必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的旧金山会议也是一个背弃国际义务基本上不能被承认的会议。”

中国在抵抗和击败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历经艰苦卓绝的奋斗,时间最长,牺牲最大,贡献最多,因之,中国人民及其所建立的新中国政府在对日和约问题上是最具合法权利的发言者和参加者。可是,美国政府操纵的旧金山和会,却把中国政府排斥在外,拒绝其出席会议。美国政府 1951 年 3 月提出的对日和约草案和备忘录,即排除中国政府参加和约。同年 4 月,英国政府对美方备忘录的覆文中,主张邀请新中国政府参加对日和约。苏联政府于 5 月 7 日对美国备忘录的答覆中,提出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参加对日和约。美国政府坚持其反对新中国的立场,在 7 月 12 日正式公布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未将中国列为和约签字国,公开表示屏弃中国于和会之外。并在 10 月 28 日照会苏联政府:开罗会议所言之中国系属“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美国又表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无外交关系,无意邀其参加对日和会。后来,美国政府又拒绝了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出席和会的代表邀请中国政府出席会议的提议。在对日作战的盟国中贡献最大的中国,却被屏弃于对日和会之门外。这

《周恩来外长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1951 年 8 月 15 日),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 98 页。

是世界和约史上前所未有的恶例,在国际关系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

退据台湾的蒋介石政府虽然曾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签署国际协议,但是 1949 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已从法理上和事实上宣告中华民国的终结。从此,台湾蒋介石政府已成为被推翻的国民党政权的残余力量,再也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了。周恩来外长在关于对日和约的声明中,早已严正指明:“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绝对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因而它没有资格参加任何有关对日和约的讨论和会议。”

然而,蒋介石政府为加紧依附美国,勾结日本,实现其“反共复国”的图谋,并在国际上保持代表中国的法律与政治地位,力图以所谓“中华民国政府”的身份,代表中国参加对日和约的拟制和签订。为此,台湾当局向美国多次进行交涉。美国政府虽有意让蒋介石政府参加对日和会,然而它无力左右所有参加缔约的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事实上,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蒋介石政府参加对日和约;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少已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或者已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也持反对或保留的态度。在盟国管制日本的最高决策机构远东委员会中,除美国 and 台湾当局之外,所有其他成员国都不支持蒋政权参加对日多边和约;相反,半数以上的成员国表示,如果蒋政权参加多边条约,它们就不参加签字。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主要伙伴英国,在这一问题上就与美国持不同的态度。英国已在 1950 年 1 月宣布承认新中国,并宣布撤消其对蒋介石政府

《周恩来外长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1950 年 12 月 4 日),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 89—91 页。

的外交承认。英国出于力图保持其在远东的殖民地,稳定对香港的统治,与中国大陆开拓商贸关系等等的利害考虑,主张由新中国政府代表中国参加和约的缔结,而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参加。1951年4月中旬,英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备忘录,提议应由人民中国参加签订对日和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尚未承认新中国,但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它们竭力主张应当参加和约的是北京而非台北。在亚洲国家中,印度、印尼、缅甸等国亦对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持保留态度或不同意见。

美国政府对苏联主张新中国参加和约的提议不予理会,却竭力谋求与英国的协调。杜勒斯为此于1951年6月中旬访问伦敦,与英国工党政府外交大臣莫礼逊磋商,双方达成一项被称为《伦敦方案》的折衷方案:既不邀请蒋介石政府,也不邀请中国大陆政府参加对日和会。6月15日,杜勒斯将协商结果告知台湾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此次在英与英外相等商议对日和约,余对英主张邀中共参加,坚决反对;而英对美主张中华民国政府参加签字,亦反对甚烈。最后,余提折衷方案即由若干国家与日签订多边条约;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何方中国商订大致相同之双边和约,英国已表同意。同时,杜勒斯以严守秘密为词,对顾维钧承诺如下:“余知日本政府对贵国态度甚好,必愿与贵国签约,而反对与中共成立关系。”

蒋介石闻讯后,于6月18日发表声明,表示“中华民国政府参加对日和约之权,绝不容疑”。认为“对日和约如无中国参加,不独对中国不公,且使对日和约失其真实性”。对不让台湾当局参加和

《顾维钧回忆录》第9分册,第115—117页。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4册,台湾中央日报社1975年中译本,第119页。

会之议提出反对。7月12日,台湾当局外交部除以书面向美方提出抗议外,其外交部长叶公超就对日和约草案发表声明,说对“未将中国列入该约签字国一节,不能不深表反对。”7月16日,蒋介石在一次演说中再次指责说:“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在华盛顿,顾维钧多次往访国务院,与杜勒斯、勒斯克进行交涉,要求美方改变主意,让蒋政府参加和会。尽管台湾当局多次提出抗议,多方游说,并发动许多所谓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发出呼吁,美国政府始终婉言相拒。

美、英两国政府在7月20日联名出面,邀请阿根廷等50个国家的政府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会。后来又邀请老挝等3国参加。9月4日,由美国操纵和主持的对日和会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与会国家52个,印度、缅甸、南斯拉夫3国受邀而拒绝参加会议。这些与会国家,其中仅有半数是对日宣战的国家,而其中实际曾与日本作战者亦只不过8个国家而已。中国是对日作战中最重要的、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国家,却被屏弃于和会之外。这说明,旧金山和会是片面的和会,在法理上、政治上和道义上都难以完全成立。和会主席艾奇逊在首次会议致词说,和约草案已经协调而成,各国代表团是来此签署和约。其意即这项和会仅为和

《蒋介石就对日和约发表郑重声明》,转引余河青《中日和平条约研究》,台湾嘉新公司文化基金会1972年版,第42页。

《中华民国年鉴》(1952年度),“台湾中华民国年鉴社”1953年版,第341页。

《蒋总统在国父纪念周发表演说》,台北《中央日报》(1951年7月17日)。

参加旧金山和会的52个国家: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波利维亚、巴西、柬埔寨、加拿大、锡兰、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明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法国、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卢森堡、墨西哥、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波兰、沙特阿拉伯、叙利亚、荷兰、菲律宾、土耳其、南非联邦、英国、美国、苏联、乌拉圭、委内瑞拉、南越、日本。

约之签定,而非和约的讨论。英、法代表支持美国的立场。为防阻苏联等国代表的干预,美、英共同制订了操控会议活动的“议事规则”。9月8日,除了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3国代表拒绝签字外,其余与会的49国代表均在和约上签了字。在对日和约签字几小时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日本首相吉田茂又在旧金山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确立了美日安保体制。它与对日和约一起构成了所谓“旧金山体制”。

《旧金山对日和约》为7章27条,分为和平、领土、安全、政治及经济、要求及财产、争议之解决以及最后条款等7个条款。这部和约实为冷战的产物,是按照美国的政治和军事的战略需要而制订的。它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旧金山和约是美国政府一手操纵并对其他许多与会国施加影响之下对日片面缔和的产物,它不仅无视中国、苏联等国政府历次声明中关于对日和约主要目标的意见,并且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对日作战盟国之列。和约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性贡献视而不见,在它关于处理盟国及其国民于战争时期在日本的财产和权益的条文中,规定起讫日期,由1941年12月7日起至1945年9月2日止,而将1941年12月7日以前中国人民独力进行抗战的举世闻名的业绩完全抹煞。

第二,旧金山和约掩饰日本的战争罪行。在冷战格局之下产生的这一和约,没有也不可能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及其罪行进行清算。日本并未以和约为契机,对自己的罪行作出真正的反省和道歉,甚至在根本上并未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相反,却竭力利用美国扶日制共的政策,多方掩饰其战争罪行和逃避战争责任。

第三,关于领土问题,和约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

岛”、“南威岛 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而不提前两者应该归还中国,后两者的主权历来属于中国。对于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等领土问题,也有同样的规定。和约还扩大了美国占有的托管地。尤其是和约以一个多边的国际条约开了“台湾地位未定”的恶例,为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依据。

第四,关于安全和政治条款,这个和约违背了波茨坦公告及远东委员会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关于“保证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威胁”及“严格取缔一切表现军国主义与侵略精神之制度”等有关规定。和约没有限制日本军备的条款,对日本军队不作限制,对军国主义团体未作取缔规定,对人民民主权利并无保障。和约规定:“各盟国方面承认日本以一个主权国家资格,具有……单独或集体自卫之权利,并得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这就为日本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并为日本参加国际军事行动,开了方便之门。

第五,关于战争赔偿问题,和约多方保护日本统治阶层的利益,只规定日本“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务,供各盟国利用,作为协助赔偿各该国修复其所受损害的费用”;同时却规定:“各盟国兹放弃其一切赔偿要求。”实际上是“借口日本缺乏付予盟国以适当的赔偿,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的能力”,而不让曾受日本侵略损害的国家向它要求赔偿。

第六,关于经济条款,和约一方面规定了使美国得以更利于对

日语中对我南沙群岛的称谓。

《旧金山对日和约》(1951年9月8日),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06页。

《旧金山对日和约》(1951年9月8日),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09—110页。

日本经济的控制,并使日本适应于美国垄断资本要求的条件,另一方面却竭力设制障碍,阻挠和限制日本与中国及其他邻国的正常经贸往来。

从当时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而言,旧金山和约显然是有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而以中国的政治全局而论,这一和约虽然排除了蒋介石政府的参加,但仍然是对它有利的,相反,却严重地损害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权益。中国政府由周恩来外长在同年9月18日对旧金山和约发表声明,指出这一和约“不仅不是全面的和约,而且完全不是真正的和约,这只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并且,严正宣告:“旧金山对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旧金山和约的签订至今已历时50周年。对于美国和日本当权者而言,这一和约象征着美日两国50年的友谊和合作。但是,对于曾经遭受日本侵略和奴役的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来说,这一和约却代表了日本对战争罪行长达半个世纪的否认和掩饰。日本右翼势力至今仍然在竭力歪曲历史,抹煞日本侵略战争,这是值得人们高度警惕的。

二 日蒋双方对缔结双边和约的政策

旧金山和会以后,美国政府从其维护美日安保体制、遏制新中国的战略企图出发,竭力促使日本吉田政府与台湾蒋介石政府尽

《周恩来外长关于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声明》(1951年9月18日),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03、104页。

快订立双边和约。蒋介石政府为挽救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政治与法律地位,加强与亚洲反共国家的互助合作,也力图盗用“中华民国”的意义,积极争取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蒋政权原先力图参加对日多边和约的计划失败后,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叶公超对顾维钧说过:“委员长本人尽管极不情愿,但已同意在多边条约之后与日本签署双边条约为最后一着。”然而,日本政府却另有打算。它从日本的利害关系考虑,一度对中日双边和约问题采取观望的态渡,“吉田茂观望英国与中国建交,而美国支持台湾政府,便采取同时与北京和台北展开‘骑墙外交’的姿态”。

美国政府在对日多边和约签订后,即示意日、蒋双方就双边和约进行谈判。1951年9月17日,美国驻台代办蓝钦告知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叶公超说:“美国已促使日本政府派员以贸易代表身份来华,洽谈两国之间的双边条约,日本政府业已同意。”在此前一周,叶公超已发出要求与日本订约的呼声。9月11日,在接见合众社副总理巴奈洛缪时,他说:“日本对各盟国都有缔结和约的同样义务,中国为盟国之一,只能与日本根据是项原则签订和约,主持缔约者有责任使日本与其以前之敌人终止战争状态。”在这前后,叶公超和顾维钧分别在台北和华盛顿与美方多次进行交涉,要求美国有关当局对日本施加影响,阻止吉田茂政府与北京议和的企图,尽快与台湾当局商订和约。9月13日,叶公超再度向外界表示:“倘东京方面与中共谈判和约,则中国(蒋介石)政府将对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之要求予以否决。”企图以安理会的否

《顾维钧回忆录》第9分册,第145—146页。

〔日〕吉田内阁刊行会编:《吉田内阁》,东京吉田内阁刊行会1954年版,第439页。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122页。

转引唐莹:《中日新关系的建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53年版,第31、32页。

转引唐莹:《中日新关系的建立》,第31、32页。

决权为由对日本当局施加影响。

9月20日,台湾当局外交部针对日本政府在和约问题上的观望、拖延态度,以及对蒋介石政权的法律地位和主权范围等问题的怀疑,向报界发表声明,提出对日双边和约3项原则:“1. 日本必须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约一项双边和约,并明白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对整个中国的主权,非仅台湾;2. 日本须承认中国国民政府为具有与签署对日和约的其他盟国同等地位之签字国家;3. 此项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时生效,并具同等地位。”台湾当局闭眼不顾国民党政府已被人民革命推翻的事实,却要求作为全中国的代表与日本政府商签和约。

日本吉田政府和执政的日本自由党内,依附美国和亲台反华的势力占有优势,但因为受到来自国内外各方面政治力量的影响和制约,也不敢贸然决定与台湾蒋政权缔约双边和约,而是暂取观望和等待时机的对策。10月25日,吉田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与从台北到访的蒋介石的特使董显光的谈话,就显示了日本政府的上述政策。冈崎表示:日本当局“深恐与贵国(指蒋介石政府)订立双边和约后,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于我之仇视”,“共产党……颇可利用我国与贵国签订双边和约为挑拨全中国人民仇日之良机,届时我国不易忍受。”冈崎同时对台湾当局之统治的有效性提出疑问,说“我国固极敬重贵国政府,所惜者目前领土仅台湾耳”。因而,他向董显光通报说:对于中日和约“我国现在政策即为徐待时机,至少在已签订之(旧金山)和约未批准之前,不致有何行动;俟我国独立自主后,自将充分研究于何时与中国以及与何一

转引唐莹:《中日新关系的建立》,第31、32页。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122—123页。

中国政府签约”。

同年 10 月 26 日,日本国会批准《旧金山对日和约》。3 天后,吉田茂在日本参议院条约委员会发言中说,“如果,中共要我国在上海设置驻外事务所,则为了通商,我们可以设置”。接着,在 30 日答复羽仁五郎的质询时,表明内阁对中日和约的态度,说:“日本现有选择缔和对手之权。关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及其将来与日本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

吉田内阁为什么不敢贸然与蒋介石政府谈和签约呢?这主要是由以下一些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日本国内各阶层中特别是左翼政治力量中,存在相当强烈的要求与新中国缔结和约的呼声。日本进步团体和日共、社会党左翼等对排除新中国的和约,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它们发表共同声明,提出“和平、永久中立、全面缔和”的主张。还在旧金山和会之前半年多,日本民间成立了“全面缔和和爱国运动协会”,并发动广泛的人民签名活动。日中友好协会于这年 6 月开会,决定从 7 月 7 日至 8 月 15 日,开展“反对排除中国的片面缔和,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行动月”活动,呼吁让新中国政府参与对日和约。金山和约签订后,东京《读卖新闻》8 月 15 日发表的民意测验显示:主张日本与新中国签订双边和约的占 36.8%,主张与台湾蒋政权签约的占 38%,认为双方均可的占 25.2%。可见在日本民间主张与北京缔约的人占有一个相当大的比例。社会上层人士中也有不少持这一主张,如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当时正在访美,他公开发表谈话,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面缔和是日本国民的要求。”

(日)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 14 册,第 122—123 页。

(日)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 14 册,第 122—123 页。

唐莹:《中日新关系的建立》,第 29 页。

其次,日本统治阶层对蒋政权的前途尚存疑问,担心与后者缔约可能带来对日本的不利。日本民主党干事长三木武吉就认为选择谁作为双边和约的对手,“这是一个出乎杜勒斯与莫理逊的智慧所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怎么能解决……所以日本应看(台海)两边,换句话说,要采取骑墙的态度,方为得策”。亲近麦克阿瑟总部的日本法学权威、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院长横田喜三郎也持同一主张,认为“和(蒋介石)国民政府签约,因其目前无法控制大陆,在效果上不大,还不如暂延一个时期”。吉田内阁又担心,一旦北京中国政府进入联合国取得合法地位,则“国民政府势将丧失现有的国际地位。果如是,日本过早与国民政府商订和约,岂不自惹麻烦。所以吉田茂采取灰色态度,以观世局的演变,企图获得最有利的形势”。

第三,日本如贸然与台湾当局缔和建交,对中国大陆的商贸往来将陷中断,而丧失大陆的廉价原料和广阔的商品市场,势将造成对自身的重大损失。旧金山和会后,日本国内要求与中国大陆重开贸易的呼声甚高,当时出版的各类经济类报刊几乎没有一家不对此发表议论,而要求重开对大陆贸易的文章几占十之八九。他们认为,日本亟需从大陆输入廉价的原料物资,如金属矿石、煤炭、盐、纺织原料、农产品等。同时,大陆是日本一个极大的商品输出市场。说到底,日本当局的“这种考虑是为了促进日本的利益,因为日本在台湾的利益实际上是有限的,而它在大陆的利益则要大得多。日本商人、实业家以及那些一贯赞成在大陆上扩大影响的人,都面临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即是否承认共产党中国,是

《日本周报》,1951年8月24日。

唐莹:《中日新关系的建立》,第28页。

唐莹:《中日新关系的建立》,第36页。

否继续与大陆发展关系;大陆对于日本远比台湾对于日本更为重要”。

第四,英国对于日本,是希望它与北京缔和建交的。英国国务大臣杨格在旧金山和会闭幕后,在金山广播电台表达英政府的意图说:“我相信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间订立个别和约乃为不可避免之事。在旧金山吾人所签订之和约,对于日本与中国之实际关系,乃委诸该两国自身十分自由的依照彼等之利益加以决定。我不认为有何国家可以阻碍此种可能性。”吉田政府深恐如日本与蒋政权缔约建交,在远东政策上就不免会与英国发生冲突。日本如果无法进占大陆市场,只有向东南亚寻求发展,而这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英国的利益,引起日英关系的紧张。

对于日本政府的观望犹豫和拖延不决,台湾当局十分不满,其主要策略是敦促美国向日本施压,阻止后者与北京缔约;同时拉拢日本右翼亲台势力,推动吉田政府与台北签订和约。当时执政的日本自由党干事长增田甲子七是与台湾当局互通声气的。他在同年8月的一期《日本周报》发文说:“太平洋战争发端于七七事变,而其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现在还在日趋强大中,虽在目前仅处台湾一隅,试问日本不与国民政府签约,还要与谁签约?”东宝电影公司董事长、前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渡边铁藏是一个反共的理论家。他在同期《日本周报》著文鼓吹,说:“现在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已极分明,日本既然站在反共的立场,则应与反共的国民政府签订和约,自属当然;况且台湾的糖、米、水果和木材,都是于日本极为重要的输入品。”日本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自由党在国会众

《顾维钧回忆录》第9分册,第174页。

唐莹:《中日新关系的建立》,第35页。

唐莹:《中日新关系的建立》,第29页。

议院占绝对多数;在参议院,民主党与自由党采取合作,后者亦可掌握多数。而自由党内主张与蒋政权缔约的占了明显的优势。

台湾当局同时以吉田茂曾和杜勒斯有过“与中华民国缔结双边和约”的谅解为由,向美方提出交涉。1951年10月31日,叶公超在台北向美代办蓝钦声称:“美国使日本立于自由阵营,竭力设法使中日间早日缔和;如任吉田长此以往,则金山和约业已完全失败。”台湾当局“外交部”并照会美国,要求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台北缔结和约。

蓝钦向华盛顿报告后,11月5日向叶公超转达美国国务院之答复:“美国政府反对日本与中共发生更密切关系之任何企图或计划。”并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努力促成中日两国进行谈判,以期缔结双边和约。”台湾当局还策动美国国会参议院56名议员,上书总统杜鲁门,提出要以日本与台北签订和约作为国会批准旧金山和约的条件,向美政府施压。美国国会内,特别是共和党一批亲台议员,以吉田茂曾向杜勒斯提供诺言,杜亦曾在参院外交委员会秘密会议上保证日本政府的诺言是具有诚意的等等为由,要求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进行交涉。

事实上,美国政府与国会是抱同一立场和政策的。美国所以煞费苦心策划对日和议,就是为了遏制苏联和围堵人民中国,因而它绝不会允许日本与北京缔和建交。假如美国肯作此让步,则杜勒斯早已在伦敦与莫礼逊达成妥协,又何必留下让日本有选择缔和对手的余地呢。

为此,杜勒斯乃偕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2个议员;参院外交委员会远东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帕门和委员史密斯,于1951年12月10日访问东京,对吉田内阁施压。吉田茂不愿立即表态,一直

《顾维钧回忆录》第9分册,第249页。

拖延至杜勒斯一行将行离日的当天,才终于接受由杜勒斯起草的一份政策性信件,由吉田署名递交杜勒斯。这份被称为《吉田书简》的信函,是于12月24日正式确定的。在美国政府的决定性的影响之下,在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势力占了上风的条件下,《吉田书简》最后确认吉田政府采取与蒋介石政府谈和签约的政策。1952年1月8日,吉田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终于公开表态,说日本不能同任何共产党国家建立关系。

《吉田书简》于1952年1月16日,在东京和华盛顿同时公开发表。这份书简首先声称:“日本政府很愿意与中国——日本的近邻——在政治上完全和平相处,并且通商。”但是,它接着就表示拒绝与人民中国建立上述关系,却宣布:“在目前,我们希望能够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建立这种关系。”《书简》公开提出:“日本政府准备一俟法律允许就与中国国民政府——如果它愿意的话——缔结条约,以便按照多边和约中提出的原则,重建两国政府间的正常关系。”表示吉田政府决心要与台湾蒋政权缔结和约,尽管吉田在书简中讳避了“和约”的称法。《书简》进而声称:“关于中华民国方面,这个双边条约的条件将适用于现在,或以后可能属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管辖的全部领土。”这就为尔后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留下了伏笔。吉田茂在书简中还大肆攻击人民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说中国政府“已被联合国谴责为侵略者,联合国因此已经对它采取了某些措施;日本现在正协助执行这些措施”。书简污蔑人民中国正在支持日共进行以暴力推翻日本政府和立宪制度的计划。吉田茂以如下一句话结束这份在中日关系史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臭名昭著的政治信函:“我可以向你保证,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

产党政权缔结一个双边条约。”

中国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于同年1月26日发表声明,严正谴责吉田信件,指出这一“吉田政府向美国政府保证与台湾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缔结和约的信件,正是旧金山非法和约之更进一步的发展。”《声明》揭露美国政府的阴谋目的,是要“正在将其一手扶植起来的日本反动政府与盘踞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用一个完全非法的所谓和约连结起来,企图造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

三 战后中日关系史上的一大逆流——《日蒋和约》

《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所确立的,由美国主宰的远东反共反华安全体制,事实上已毫无疑问地决定了日本政府必将与蒋介石政权缔结和约。《吉田书简》的出笼乃是把此种必然性突显出来,排除了日本政府的摇摆,促进了日蒋之间的议和缔约的进程。

日蒋之间的和约谈判是在1950年2月正式开场的。2月12日,日本政府宣布组成“使华谈判代表团”,全权代表河田烈,首席随员木村四郎七(日本驻台北海外事务所所长);团员4人:后宫

《吉田茂致杜勒斯的信》(1951年12月24日),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17页。

《章汉夫副外长关于日本吉田政府向美国政府保证与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缔结和约的声明》(1952年1月23日),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19页。

河田烈(1883—1961),日本资深官僚。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长期从政,在日本内阁大藏省服务多年,累升至副藏相、内阁秘书长。1940年出任大藏相。1942年任日本台湾拓植会社社长。战后一度从商。为吉田茂之表兄弟和密友。

虎郎(外务省亚洲局第二课课长)、中田丰子代(外务省官员)、真崎秀树(国际协力局第四课课长)、力石健四郎(条约局第一课主任秘书);顾问2人:滕汀(前台湾拓植会社社长)、井上清一(前内阁官房副长官);另有秘书和事务员各2名。2月15日,蒋介石任命叶公超为和约特派代表团全权代表,胡庆育(“外交部”政务次长)为副代表;团员8人:汪孝熙(“外交部”亚东司司长)、薛毓琪(条约司司长)、孙秉乾(“外交部”专员)、凌崇熙(同上)、钮乃圣(同上)、赖家球(亚东司科长)、胡骏(同上)、濮德珩(情报司专员);顾问5人:邵毓麟、黄朝琴、陈启天、刘泗英、万鸿图。蒋介石另又指定“总统府资政”张群等9人组成顾问委员会,为指导和约谈判的最高决策机构。

河田烈等人于2月17日抵台北,18日叶公超与河田烈作首次会谈。19日胡庆育与木村四郎七举行和约筹备会议。20日,日蒋和约谈判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从而开始了一波三折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历程。这一缔和谈判先后举行正式会议3次,非正式会议18次,共历时67日。至4月27日,始将获得一致协议的全部文件予以通过。4月28日,双方全权代表在文件上予以签署。

日蒋和约谈判是在双方不断争执、互争利害的过程中进行的。日方竭力利用蒋政权内外交困、正处于弱势地位,又急于缔约的态势,尽量压低条件,逼蒋方就范。蒋方则十分害怕在条约中被定位为一个局囿于台湾的地方政权,不惜作出重大让步,以换取维持所谓“中华民国”的国家地位。综观谈判从初步接触到签约的全过程,大体上经过4个阶段。

从《吉田书简》发表到台北谈判开始之前为初步接触阶段,双方围绕着双边和约的谈判原则进行交涉。1月19日,叶公超向前来摸底、试探的木村四郎七说明蒋方对谈判的立场,主要是:“1. 国民政府必须在与其它盟国平等的立场上,与日本缔结双边和约;

2. 双边和约应在旧金山多边和约生效前在台北予以签订;双边和约应与多边和约同时生效;3. 国民政府将拒绝日本拟缔结的任何不完全的‘友好条约’,对于日本有限度的承认国民政府亦将加以拒绝。”对此,吉田茂与冈崎胜男、木村四郎七等人在 21 日进行会商;决定对蒋方的一部分要求不予理会。

2 月 6 日,日本政府发言人在国会发表关于日蒋和约的声明,大要为: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有可能与台湾当局签订“双边条约”,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中已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的权利和要求,“日本政府相信,两岛屿的最后处置,应由盟国决定”,双边条约对此不应采取和约未有的步骤;“商议中的双边条约……将与全面和约不同,也可以把它称作……‘有限度和约’”等等。显然,日本的目的是想利用蒋政权的弱势地位,在“有限度和约”的幌子下,讳避日本的战败国地位和战争责任问题,并为尔后与中国大陆交往预留余地。

日本政府的上述声明遭到蒋方的指责与拒绝。蒋介石对其和谈代表团提出了 3 项底线:“1. 如果日本不希望与中国签订一项正式的和平条约,则日本代表团不必来台;2. 中国政府系代表整个中国,并非仅为台湾或其他现时辖治下的领土;3. 中日和平条约应与旧金山的多边和约属同一类型。”接着,在双方交换谈判代表团任命书时,日方河田烈的“全权代表勅令”中,只是受命签订“日华条约”而无“中日和平条约”字样,遭到蒋方的拒绝。日方最后请美国方面调解,蒋方始作出“来了再说”让步。显然,在条约性质与适用范围的问题上,双方一开始就发生歧见与争执。

从 2 月 20 日台北和会正式开始到同月 28 日谈判搁浅为第一

唐莹:《中日新关系的建立》,第 46 页。

唐莹:《中日新关系的建立》,第 49 页。

阶段,双方围绕着条约的性质问题进行谈判。叶公超在 20 日首次正式会议上向日方提交称为《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初草》的和约草案,声明双方谈判应以此为基础。这份草案仿照旧金山和约的规制,共列 7 章 22 条。其要点如下:“1. 和约实施范围,适用于中华民国政府现时控制之地区及将来控制的地区,而不影响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之主权;2. 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列岛、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台澎等地区人民及法人,为中华民国的人民及法人;3. 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的战争,由 1931 年 9 月 18 日沈阳事变而导致;4. 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因战争状态之存在而引起的任何问题,均依照旧金山和约之有关规定予以解决;5. 日本同意废弃于 1941 年 12 月 9 日以前与中华民国所订的一切条约与协定;6. 日本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与利益,包括辛丑条约之最后议定书、附件、照会及说帖中有关日本的规定,均予撤废;7. 日本准备迅即与中华民国进行缔结贸易、航业、渔业协定及民用航空运输协定;8. 依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之规定,日本对中华民国应提供劳务补偿;9. 中日和约签订后,倘日本与任何国家之间签定协定,中华民国应享有盟国待遇。”

日方一开始就坚守谈判防线,寸步不让,并竭力压低对方条件,迫蒋方后退。本来,和平条约的根本前提是对业已结束的这场战争及其责任,作出正确、公正的定位。但在蒋方提出的和约草案中,却一字不提日本对中国之战是一场侵略战争,也不提日本的战争责任。日方更是得寸进尺,河田烈在首次正式会议致词中说:“以往中、日两国之间,屡次发生不幸的事件,以致违背两国国民衷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华民国对日和约》,台北 1966 年版,第 8—22、5 页;另据唐莹:《中日新关系的建立》,第 58—59 页。

心企求和平的真意,而陷入战争状态,我们实在以为惋惜。”作为和谈代表,却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把日本侵略战争说成是两国间发生的“不幸事件”,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相反却把侵略成性的日本美化为具有“衷心企求和平的真意”。同时,日方并不承认将要签订的条约为日本与“中华民国”间的和平条约。吉田茂此前在日本众议院的谈话,已表明:“日本与国民政府订约,将以之作为一个地方性政权”,日本“承认”对方为“一个在若干地方行使政权之政府,而与之建立睦邻关系”,即是说将要缔结的并非是“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条约”,而是日本与国外的一个地方政权之间的睦邻关系条约。河田烈在2月23日会谈时,也宣称:目前双边条约的拟定,应根据现实环境,为重开未来中日全面外交关系作准备。日方不同意仿照旧金山和约,亦反对将战败国条款列于对日条约之内。日方对蒋方所提的和约草案,并未直接予以拒绝;但公开表示:“中方和约草案与日方所构想者,在基本精神上,显有不同。”事实上,以日方的立场,贯穿蒋方所提草案中的9项要点,除其中第7项外,其余8项日方均不予接受。

双方经过5天的交涉,至2月27日第三次非正式会议上,日方始表示:“对条约名称暂可同意其为《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3月1日上午,美驻台代办蓝钦与叶公超进行会谈,美方对台北谈判再次进行干预。同日下午,日蒋双方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对条约名称正式获致协议,但对条约适用范围仍存重大分歧。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华民国对日和约》,台北1966年版,第8—22、5页;另据唐莹:《中日新关系的建立》,第58—59页。

《中华民国对日和约》,第23、27页。

《中华民国对日和约》,第23、27页。

《中华民国对日和约》,第23、27页。

从3月1日至同月28日为和谈的第二阶段,对和约的实质部分进行谈判。河田烈于3月1日下午向蒋方首次提出日方所拟的和约草案,希望作为谈判的基础。该草案的主要内容可归结为以下6项:“1. 和约生效之日起,中日两国即结束战争状态;2. 日本政府将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及附近地区之权益;3. 在尽快期内,中日两国在友好的基础上缔结商务及航运条约;4. 两国战争开始正式日期,应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日期算起;5. 和约经两国政府批准并换文应即开始生效;6. 和约适用于中国国民政府现时管治地区或嗣后管治地区。”在这里,日方把太平洋战争开始作为战争的起点,对于此前长达10年的侵华战争矢口否认,也未承认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对其应负的战争责任和战争赔偿更是一字不提。显然,日本政府企图利用中国处于分裂状态之际,混水摸鱼,诱使蒋方就其范围。当时,叶公超仍坚持要以蒋方的和约草案作为谈判的基础。

3月5日至7日,双方举行非正式会议,就蒋方草案第六至第二十一条逐条进行会商。其中关涉甚广,包括关于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对华条约、日本放弃在华一切特权、日本战犯处置、商务、民用航空、渔业、战争赔偿、归还中方财产、日本在中立国资产之处理、司法复判、日本在战前的契约义务、日本放弃因战事引起之要求、中方参与德国在日财产之处分、和约的解释、和约适用范围,以及日本给予中方以盟国最惠国待遇等等各项问题。双方对其中相当部分条款达成初步协议,然而在蒋方要求的中方具有盟国地位(最惠国条款)、劳务补偿、和约适用范围、伪政权财产归属等问题上,仍然争执不休,未取得一致。

此时,美国政府为使国会早日批准旧金山和约,力促日蒋双方

唐莹:《中日新关系的建立》,第65页。

尽快完成和约。日本外务省于是派出条约局局长倭岛英二于3月8日到台北,与河田烈会商后,拟就日本代表团关于双边和约的第二份草案(13条)。3月12日,河田烈将该份草案提交蒋方。17日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再次对赔偿问题及和约适用范围问题进行讨论。同日,叶公超向蓝钦发出《备忘录》,指陈谈判情形说:“将……日方约稿与中国约稿作一比较,即可显示中、日双方代表对中国约稿之各项条款,除下列各节外,大体上已获致协议。”这未获协议的各节,共有6条,而主要的是赔偿条款和对盟国实施的最惠国条款2条。《备忘录》表示蒋方愿意尽可能对日妥协,说:“事实上除其中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及第二十一条外,中国对其他条款均愿与日方达成折中协议。”并认为“目前乃为美国政府对日本运用力量俾使和约谈判早获结果之时机”。

3月19日,在第八次非正式会议上,蒋方正式表明愿自动放弃劳务补偿。同时,蒋方表示:对日方之13条草案,有的完全同意,有的实质同意,有的稍作修改或加以归并即可同意;另将最惠国盟国条款专列为1条;其他如适用范围问题、财产处理问题等可按妥协办法,以“换文”、“拟定书”等形式规定。在胡庆育与木村四郎七连续几天就伪政权在日财产、盟国最惠国等遇、劳务补偿、适用范围等问题的谈判后,在3月25日的第九次非正式会议上,蒋方提出第二份《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14条),以及《议定书》2件、《换文》2件。日方在原则上表示接受。

从3月28日日方第一次推翻协议至4月28日双边和约签订,为和谈第三阶段。3月28日,河田烈向叶公超转达日本政府

《叶公超致蓝钦备忘录》,《中华民国对日和约》,第127—129页。

《叶公超致蓝钦备忘录》,《中华民国对日和约》,第127—129页。

《台北外交部致顾维钧电》,《顾维钧回忆录》第9分册,第305—307页。

拒绝接受 25 日协议的若干重要条款的训令,第三次提出一个否定 25 日协议的《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草案》(新 13 条),遭蒋方的拒绝。31 日,蒋政府召开 9 人顾问委员会对和约谈判进行会商,“决定坚持原有立场,无可更改”,但在部分问题上准备再作妥协,因台湾当局绝不愿和谈归于破裂。4 月 1 日,美代办蓝钦访问叶公超,表示美国政府对日蒋和约谈判陷于停顿颇为焦虑;并声称:如会谈破裂,美国国务院将采取行动,出面斡旋。

事实上,蒋日双方均无意使和谈破裂,只不过是和议最后阶段尽力互争利害而已。4 月 2 日,叶公超向日方提交一份《备忘录》,对所持基本要求,不容变更,尤其有关盟国地位之最惠国待遇依然坚持,但对赔偿问题允作让步。日方在 5 日至 7 日,倭岛英二与河田烈在台北连日会商的结果,稍为改变东京的新训令,作出若干让步,并拟成一新的建议案,较新 13 条草案具有妥协性。4 月 8 日,双方代表就日方所提出的《日本全权代表递交中国全权代表意见书》,逐项进行会谈。

日蒋和议至此已近达成,叶公超 9 日在行政院的报告称:“日本在 8 日非正式会议中所提出的建议案,表示在精神上接受中国的要求,但不赞同出诸具体的措词。”双方尚有 4 项重要问题未得协议:一是蒋方要求获得盟国最惠国待遇,日方尚未作明确表示。二是日方主张和约适用范围限于台澎及将来可能控制的领土;蒋方则要求在条约中规定其“对中国大陆的主权,不因此而有所影响”。三是日方不仅要求双方作为通商国家彼此都享有同等权益,还欲在和约中列为可享互惠权利之国家;蒋方反对此点。四是蒋方放弃对日本劳务补偿的要求,但坚持要求日本在条约中首先承认负有此种赔偿之义务;日方则坚持蒋方径行取消赔偿。

蒋介石等人在4月8日至11日间再次对和议进行会商,鉴于美国国会参议院已于3月20日批准旧金山和约,乃决定在“主权及于大陆”和劳务补偿等问题上再次作出让步。12日至15日,双方举行第十至第十五次非正式会议,先后对和约正文、议定书和换文,以及伪政权在日资产等事项进行谈判,并在基本上获致协议。但是,日本政府获悉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起生效,遂态度又趋强硬,于17日向河田烈发出新训令,推翻已达成之协议。日本政府对以下3项问题要求重行谈判:1. 和约适用范围问题,在换文中所用文句之“及”字,必须改为“或”字,即表述为“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的全部领土”。2. 伪政权财产归还中方问题,要求从协议中删除。3. 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未经中国同意而设置于中国的日本使领馆之财产,重申归还日本的要求。蒋方遂与日方进行最后的交涉。21日,张群与河田烈进行会谈。23日至24日,双方代表对上述3项问题连续举行谈判。最后蒋方又作让步,对适用范围问题,同意在《照会》第一号内用日方要求表述,另在《同意记录》中写明上述照会中“或将来在其……”字样可认为具有“及将来在其……”之意。同样,关于伪政权财产等几个问题,亦退至在《同意记录》中记述的方法,作出妥协。

1952年4月28日,日蒋和约在台北正式签字。协议文件共分4个部分:一、《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14条);二、《议定书》(2项);三、《照会》(2号);四、《同意记录》(4项)。在和约整个谈判过程中,日方步步进逼,寸步不让,而蒋方每每委屈求全,步步后退,最后以满足日方的要求而告终。对于此种情形,台湾一位专研日蒋和约的作者十分慨叹地写道:“窃以为我方以一个战胜国之身份订立此种和约,在外交上是一大遗憾,因为金山和约中对战败国已给予优厚之待遇,而我根据此和约所拟之约稿,竟被对方删改,和谈中又遭受战败国的捉弄,屡以我方及早观成之意切心理,

再三延宕,最后利用金山和约之即将生效,与我摊牌,而我亦委屈与之缔结,这可说是有史以来未有之先例,岂不令人愤慨兴叹!?”这位论者深为蒋介石政府的外交失败痛惜,似乎也为中国的不幸而愤慨兴叹。然而,他却没有看到,蒋介石政府此时已被中国人民革命所推翻,早已丧失代表中国议和缔约的资格和条件,它又怎么能谈得上在这场双边和约谈判中赢得胜利呢?

中国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于1952年5月5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操纵下的日本吉田政府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缔结所谓“和平条约”,并表示“坚决反对”,指出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这些非法条约的宣布和订立,是美国反动派及其走狗们在远东制造新的战争的阴谋又向前走了一步的表现”。

《日蒋和约》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只是充当了一个极不光彩的逆流的角色。它终究是要被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浩浩荡荡向前涌动的历史主流所冲涤,而席卷以去的。1972年9月,日本政府首相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北京访问。中日两国总理和外长签署《联合声明》。从此,中日两国结束了半个多世纪的敌对关系,开始实现邦交正常化,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时期。在双方制定《联合声明》的过程中,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表示,“对中方所说‘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我们无任何异议”;但为照顾日本政府在国内的处境,大平希望在声明文字中避免提及,而由日方在双方邦交正常化时,自行声言《日蒋和约》的终止。中国方面对此表示理解。在两国外长商谈联合声明时确认,“为照顾日方的困难,决定‘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这一条不

余河青:《中日和平条约研究》,第89页。

《周恩来外长关于美国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的声明》(1952年5月5日),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22—125页。

再写入声明内,而用日本外交大臣谈话的形式宣告该条约的结束”。同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签字后,大平正芳在北京向外界表示:“中日和约(日蒋和约)已失去它的意义,业已終了。”

四 两个和约与“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出笼

《旧金山和约》与《日蒋和约》,在实际上确认了由杜鲁门政府炮制而获得吉田茂政府支持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两个对日本的和平条约,作为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对日战争的和平条约,不仅没有理所当然地确定把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而曾被日本侵占了半个世纪之外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于中国;相反,却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在日本放弃后归属于谁的问题,列为一个未经确定的悬案,而予以冻结。这一行径,在国际条约中对台湾地位问题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

《旧金山和约》的一个重要部份是关于领土问题的条款,其中第二条第二款关于台湾、澎湖列岛有如下的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及要求。”其第六款关于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有如下之规定:“六、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对日和议,始终抱定“以金山和约之原则为准绳”,在领土问题上自不敢违

张香山:《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7页。

《旧金山对日和约》(1951年9月7日),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05页。

《旧金山对日和约》(1951年9月7日),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05页。

反《旧金山和约》的有关规定,而越雷池一步。《日蒋和约》第二条正是不折不扣地按照这一原则作出规定的,该条款表述道:“兹承认依照公历 1951 年 9 月 8 日在美利坚合众国金山市签订之对日和约第二条,日本国业已放弃对于台湾及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名义与要求。”

《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作为在国际关系上和法律上结束盟国对日战争状态的和平条约,在事关中国的台湾及澎湖群岛的领土问题上,却公然违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英苏四大盟国之间早已达成的有关的国际协议和公告,铸成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这两个和平条约,虽然确定或确认日本放弃对上述领土的一切权利、名义与要求,但却对于这些领土的归属于谁的问题避而不谈,实际上,也就是将应当归还中国这样一个理所当然的作为和约必具的基本要项,在条约中一笔钩销了。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对日本提出的各项条件和要求,包括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在日本宣布投降时,已为日本政府全部接受。1945 年 8 月 10 日,经由瑞士、瑞典两国政府转交于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的《日本政府乞降照会》,明确承诺:“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于 1945 年 7 月 26 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所经苏联政府赞成的联合公告所列举的条款。”

美国政府主宰的《旧金山和约》及其导演的《日蒋和约》,在台湾和澎湖的主权归属问题上,公然违背美国政府曾经参与并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这反映了二战时

《中日和平条约》(1952 年 4 月 28 日),“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华民国对日和约》,第 333 页。

《日本政府乞降照会》(1945 年 8 月 10 日),《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 5 页。

期和冷战时期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国际背景之下,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变化。

所谓“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湾中立化”政策的最初炮制者,正是直接策划《旧金山和约》和促成《日蒋和约》的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此人1950年春受美国国务卿之聘为顾问,襄赞远东事务,他从美苏两极对抗,争夺亚太地区的战略全局立论,密陈“台湾中立化”之策,并得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勒斯克之赞同。1950年5月18日,杜勒斯向艾奇逊提出政策建议书,其主要观点和策略如下:“(1)综观国际形势,国民政府失去中国大陆之后,远东均局,已转向于苏俄。(2)今如对台再作让步,不但亚洲诸国此后将惟苏联马首是瞻,即西德与欧洲各国,亦将对美发生不可信赖之怀疑。(3)国际共产党贪得无厌,美国早晚终当加以限制;如加限制,台湾是一最理想的地区,一因地距苏联较远,不致引起对苏作战,二因防护台湾,海空两军,当已够用,纵或尚需陆军,而台湾尚在美国友好国家手中,仍可利用,三因台湾身份未定,中立主张,尚有恊藉之余地。中立台湾,自亦尚有引起中共对美之军事风险与中华民国对美之政治纠纷,但此风险与纠纷,尚在我们力量可以控驭之范围,较诸世局失衡,困扰尚轻,苏俄原子武力,日增月累,两年之后更难制,时期已迫,宜早定策。”艾奇逊对此建议甚为赞赏,待到朝鲜战争爆发,此议乃付诸实施。

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召集的高级军政官员会议上,决定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中共军队攻击台湾,同时通知台湾蒋介石政府勿对中国大陆进行攻击。艾奇逊并提出,台湾未来地位,可由联合国决定。杜鲁门表示:“或由对日和约决定。”此外,杜鲁门曾在会上

F. R. 1950, V01, PP. 349—351, 转引梁敬鐸:《中美关系论文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204—205页。

提出,台湾归还日本,由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实行管理;对于此议,会议未作定论。6月27日,杜鲁门就朝鲜局势发表声明,说:“对韩国的攻击,显然表示共产主义已不复沿用颠覆手段,以征服独立国家。而进一步使用武装侵略及战争来达到目的……在此情形之下,如共党军队占领台湾,势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区域之安全,并威胁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任务的美国军队。因此,本人已命令第七舰队防止共党对台湾之任何攻击。同时,本人已要求在台湾之中国政府,停止其对大陆之一切海空军攻击活动。第七舰队将负责观察此一要求是否已付诸实施。至于台湾的未来地位,必须待太平洋安全恢复、与日本订立和约后再行决定,或者由联合国予以考虑。”杜鲁门这一声明,推翻了他在1月5日发表的关于台湾已属于中国领土的声明,公开宣布了美国政府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和“台湾中立化”的政策。

《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关于台湾、澎湖列岛的主权归属问题的条文,完全是适应杜鲁门政府上述政策的需要,并为其制造法律根据的。对此,国际法专家邱宏达教授曾作过透彻的论析:“韩战使美国决定这个战略性岛屿(指台澎)不能由一敌对的政权所控制,因此,美国须为它的干涉、阻挠中共‘解放’台湾制造一个法律根据。从美国的角度看来,如果台湾的地位能被称作‘未定’,则它较易在法理上找寻派海军进入台湾海峡的理由。基于这个考虑,美国便草拟了对日和约中有关台湾地位的条文。”

综上所述,杜鲁门政府为在西太平洋构建一条从阿留申群岛到菲律宾的反共战线,围堵人民中国,遏制苏联向亚太地区伸展势

《杜鲁门关于朝鲜局势的声明》(1950年6月27日),《新华月报》1950年7月号。

邱宏达:《中国、美国与台湾问题》,《中国与台湾问题的分析与文件汇编》,纽约帕里格公司1973年版,第128页。

力范围,把台湾作为这一战线中的一环而加以控制,从而炮制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并把它塞进对日和约。那么,日本吉田茂政府热衷于接受并坚持“台湾地位未定”论,又是为了什么呢?

日本战败投降,被迫接受《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统治阶级对台湾的野心已经抛弃。曾经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和奴役台湾人民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日本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势力,对于他们在战后被赶出台湾,被迫把台湾归还中国是不甘心的;而且在多年来一直抱着重新并吞台湾的野心,这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日本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势力追随美国,制造“台湾地位未定”,就是企图把台湾纳入美国的霸权体系,利用美国的庇护来实现其重新霸占台湾的野心。

事实上,在战后,除了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左翼等一些进步的党派团体之外,日本资产阶级各个政党,尤其是不甘心失败的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势力,从未停止过重新统治台湾,恢复其昔日的殖民统治的活动。美国政府抛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尽管是着眼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但对于日本重新觊觎台湾的野心恰正相吻合,而且被后者视为提供了一种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根据。两者不谋而合,决非偶然。

杜鲁门政府的台湾政策,使日本插手台湾、重返台湾的逆流甚嚣尘上。从《旧金山和约》到《日蒋和约》缔结前后,就资产阶级各政党而言:“当时日本,除自由党外,其余各政党竟均表示对台湾不忘情。绿风会并有收回台湾的拟议。”吉田茂政府与台湾当局商谈和约时,始终坚持“台湾地位未定”的立场,只承诺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的权利和要求,而绝不承认台澎归还中国,台湾主权属于中国。1952年2月6日,日本政府发言人在日本国会发表的关于

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湾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年版,第126页。

中日和约声明中,公然否认中国对台湾、澎湖的主权,说台湾的地位应由盟国来决定。他宣称:“日本在旧金山条约中已放弃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权利和要求,但对该地区的最后处置则未有规定。日本政府相信,两岛屿的最后处置,应由盟国决定。并协议因此日本政府并无权力采取在旧金山和约所已同意以外的步骤。”三、四月间,正当日蒋双方代表团为和平条约适用范围等问题在台北争论不休之时,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倭岛英二在东京约见台湾当局驻日代表团顾问陈延炯,毫不掩饰地表示:“台湾的国际地位尚未明了,台湾人是否为国民政府之人民,亦无法可据。”强调台湾国际地位未明,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缺乏法律根据,意在拒绝在和约中纳入明定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文。

《日蒋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如出一辙,没有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任何条文,显然体现“台湾地位未定”的基调。河田烈关于《日蒋条约》附件《照会》的咨文中说:“关于日本签订之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和平条约,本代表谨代表本国政府提及贵我双方所成立之了解,即:本约各条款,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的全部领土。”在这里,“‘政府控制下的领土’,并不就等于‘国家主权所属领土’,暗示台湾澎湖的‘主权未定’。”

日本吉田政府的这一态度,实质上隐含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它在不得以只能在和约中放弃昔日的殖民地台湾时,顽固地拒绝表明其归属,从而留下“台湾地位未定”的余地,以利于日后日本重

转引唐莹:《中日新关系的建立》,第134、48页。

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湾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年版,第126页。

《日台和平条约》,《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65页。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台湾中华日报社1980年版,第86页。

新染指台湾和澎湖列岛。吉田茂在其后说过,签订《日蒋和约》“这只是日本政府放弃了领土权……归属尚未决定”。曾在台湾总督府任职的日本台湾问题专家井出季和太,更是在商议和约之际,露骨地提出由日本管理台湾的论调:“以台湾充当美国军事基地为条件,以联合国托管的名义,移交给日本进行行政管理,是最为合理的措施。”一语道出了日本右翼势力的狼子野心。

对于美、日两国政府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当局处于十分矛盾的地位。它一方面坚持台、澎的主权属于中国——所谓“中华民国”这一立场;另一方面,出于为保持和维护其与美国、日本之间的关系,以利于反共自保,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两个和约中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安排。

美国最初提出的对日和约要点,即排除了台、澎归还中国的内容。1950年10月,美国国务院制订的对日和约七项原则,规定台、澎地位须待将来另经中美苏英四国协商决定;如在和约生效后1年之内,尚未获致协议,则由联合国大会予以决定。对此,起初蒋介石政府不予接受,认为“杜勒斯此一提案,对于台湾及澎湖列岛的地位有欠明确表示。这些岛屿在历史上、种族上、法律上、事实上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早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共同宣言中,已有‘归还中国’的明确规定,嗣后并经为日本所接受的促其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中再加认定”。

为此,台湾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于1950年10月20日在纽约向杜勒斯提出交涉。杜勒斯向顾道出美国政府的意图:“美国的用意,是要将台湾的地位暂予冻结。因美国虽切望世界大战不再爆

〔日〕吉田茂:《世界与日本》,东京番町书局1963年版,第141页。

〔日〕井出季和太:《讲和会议与台湾的归趋》,东京,两田居1960年版,第218页。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4册,台湾中央日报社1975年版,第116页。

发,但并无把握。美国决不希望台湾落入仇视美国者之手,尤不愿为苏联所利用。美国人力不足对太平洋防卫,只能利用海军、空军树立坚固防线。倘一旦有事,美国能控制亚洲大陆沿海,而台湾岛正在防线之内。是故冻结台湾地位,即是维护国民政府的地位。”杜勒斯并且向顾维钧指出:“假如美国已将台湾当做完全是中国领土看待,不仅中国政府的代表权问题必须迅予解决,而美国派遣其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亦将失去法理上的依据。”

顾维钧从台湾政权所处的岌岌可危的形势考虑,认为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和冻结台湾的策略对蒋政权是有利的。10月27日,他致电王世杰转告蒋介石,再次为此申述,说“美惟采此立场,方能贯彻其保台宗旨,而维持我政府地位。否则中共所坚持台湾为中国领土,而视美对台措施为干涉内政,按之联合国宪章第二款规定,美亦将难辩护。职此之故,杜顾问深望我不坚持反对美之立场,以致损害美我两方共同利益”。

在当时,美国对台湾的支援和协防,关系蒋介石政府的生死存亡。于是,蒋政府对“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湾中立化”采取表面上表示接受,实际上不予承认的政策。同年12月19日,顾维钧奉命与杜勒斯就对日和约问题再次举行会商。顾表达台湾当局的态度:“我政府希望在未来对日和约中,只要求日本根据波茨坦宣言所订投降条件,宣布放弃对有关领土的所有主权就够了,不要进一步要求日本确定将该等领土交还何国。”杜勒斯当即表示同意,随后于1951年3月20日覆函顾维钧,告以美国政府接受台湾当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金山和约与中日和约的关系》,1966年版第5—7、11—12页。

《顾维钧回忆录》第9分册,第30—31页。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金山和约与中日和约的关系》,1966年版第5—7、11—12页。

局的上述要求。以后,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都只是表明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的权利、权利根据和要求,而只字未提其主权属于中国。这一处置,在蒋政权看来虽然并非完全满意,但对挽救其危局、保持孤岛的统治是十分有利的。然而,这却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反对中国统一、企图分离台湾的那些政治势力,尔后一再把这两个和约作为搞“台湾地位未定”,制造“两个中国”和“托管台湾”,以致搞“台湾独立”的一种所谓“依据”,或利用它充当筹码。

时至今日,那些坚持“台独”的政治势力仍然没有忘记利用旧金山和约等等,作为鼓吹“台独”的工具。今年 7 月 31 日,在美国旧金山州府大楼举办的纪念旧金山和约 50 周年图片展的开幕式上,台湾民进党的一个头目在讲话中声称:“旧金山和约在 1951 年签署时,日本曾明确表示,将放弃包括台湾……以及琉球的主权,而在这项和约之后,没有任何国际条约谈到台湾国际定位的问题。”公然借旧金山和约鼓吹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未定。这再次说明,正确剖析和评价这两个和约,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当前仍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余子道,1931 年生,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刘 兵)

美国《世界日报》波士顿版,2001 年 8 月 2 日。